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

——李先念经济思想研究札记

邹惠卿

一切活动要为发展经济服务

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剥夺了剥夺者，主宰了社会的生产资料，并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社会的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斗争趋于缓和以后，应该立即集中主要力量，建立起新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大厦，以便巩固人民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李先念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运用这些原理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推进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全国一解放，李先念在湖北就着手抓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工作，提出了“活跃城乡经济，巩固人民政权”的口号，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使一切活动都为发展经济服务，为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服务。

在剿匪反霸斗争中，李先念一方面组织军民消灭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残余土匪武装，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壮大劳动群众的声威，支援城乡恢复和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发动组织城乡人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保证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调动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支持剿匪反霸。李先念对当时湖北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他认为湖北农业生产的条件，除边远山区外，一般都比较好；地处华中，交通比较便利；城市多是消费性与商业性的，工业较少，对农村依赖很大。虽然说湖北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但是就农村来看，现时农村仍然处在封建势力压榨下，群众难以扬眉吐气。农民生活穷困，饥寒交迫，生产无法提高，既不能提供较多的工业原料，又无较大的购买力；城市经济很脆弱，由于长

年战争的破坏，加上受官僚资本的限制，经济大为萧条。特别是在农村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城市经济更难繁荣起来，工人大量失业。与此同时，城乡内外流通又阻塞，城市工业品不能下乡，农民买不到必需的生活用品，农产品又不能外销，更是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封建地主经济和民族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依旧，并相互结合加强剥削。特别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仍在利用这一经济作为基础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针对以上情况，李先念认为，必须尽快摧毁封建地主经济，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要大力恢复城乡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迅速建立起人民政权的强大经济基础。在目前，首先是发展农业。他指出：“我们要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农村，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必须搞好农村工作，发展农业经济。”^①以农业生产配合工业，为工业提供较多的原料和市场。在此同时也大力搞好城市工作。李先念说：“城市的中心工作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搞好城市内部物资调剂，发展内外贸易。”处理好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就是要在关心与照顾工人的生活 and 利益时，不要影响资本家的积极性，并且要鼓励资本家积极投资于有利国民生計的各项事业。“在城乡关系上，应着重沟通城乡贸易并帮助乡村剿匪反霸。”^②他说：“我们的方针是坚决消灭反动的统治，建立人民的统治，并造成进行土地改革的基

本条件，使农村的反封建与城市的发展工商业妥善地结合起来，活跃城乡经济，巩固人民的政权。”^③

在建国初期的统战工作中，李先念强调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一道革命和建设。他指出：“目前，我们要把全省村农土地改革的工作做好，要合理调整公私关系、工商关系、劳资关系，使城乡生产进一步恢复与发展。”同时，要有步骤地谨慎地改造旧有文化教育工作。“完成这一系列艰巨任务，要动员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的力量来办，动员各界有识之士来办，才能办好，因此，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具有莫大的意义。”李先念认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要处理好各方面的政治关系。但是他又认为，要处理好政治关系，首先必须处理好经济关系。他指出：“须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关系调整不好，政治上的团结必然遭到损害。”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调整好各方面的政治关系，其目的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伟大的经济建设。关于这一点，李先念的思想是明确的。他说：“我们要坚决团结各民主党派、各革命阶级、各界进步人士，诚心诚意与他们共同合作，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④

在土地改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李先念更是十分注意发展经济。本来，土地改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建立起完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其目的是彻底地解放生产力，以比旧社会快得多的速度发展经济。关于土地改革，李先念说：“早在土地改革开始的时候，中央就指出，必须把土地改革搞好，为经济建设打好基础。”^⑤

为了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为经济建设打好基础，李先念指出，必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执行正确的路线。不能右也不能“左”。如果不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右，它不能建立农村的新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解放农业生产力，不能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是要打败仗的；但是，不讲方针、政策，侵犯中农的利益，打击工商业，普遍追挖底财，把地主和富农都扫地出门等是“左”，它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孤立了贫雇农，打击了生产积极性，同样不能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也是要打败仗的。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李先念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要因为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方法、措施不当而影响生产积极性。尤其要注意不要妨碍广大农民和手工业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他说：“个体的积极性，只要用在生产上就是好的。”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工农业生产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应该有相应的提高。

就是党组织的建设、干部队伍和干部思想建设，也都要考虑为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国民经济服务。全国一解放，政治斗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李先念就极富远见地积极发展党组织，大量提拔新干部和加强干部的思想建设，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作人材准备。他说，过去我们不可能象今天这样提出积极建党与大量提拔干部的任务。

“今天的情况变了，我们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以便经过长期努力，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建设社会主义。”“这就需要我们党吸收大量的先进分子到党内来，需要选拔大量懂得以至精通经济、政治、文化各项业务的干部。”以便在新的战线，在新的更为艰巨，更为持久的任务面前，能领导和组织起群众取得新的胜利。因此，“积极发展党组织和大量提拔新干部，不但关系着目前工作任务的完成，

而且关系着今后能否建设好社会主义的问题。”^⑤针对当时干部思想中存在的盲目乐观、麻痹松劲和临时观点,李先念指出:“全体党员必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努力学习,懂得实现最终目的的策略和步骤,以满腔热情和坚定毅力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他说:“有的同志,只看到已有的成绩,看不到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比如只看到土改任务完成了,看不见农村山上无树、堰塘无水、房屋破旧的贫困落后状况还没有改变,在那里只是叫好,作胜利美梦。”还有一些干部有临时观点,不安心工作。“这也是考虑个人的利害多,考虑建设国家、建设农村的伟大事业少。”它不利于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因此,李先念希望广大干部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并认识到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是艰巨的、光荣的,应该以惊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完成新的任务。

一切有碍生产发展的事情应尽量避免

李先念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出发,他认为办一切事情都要从发展国民经济,壮大无产阶级上层建筑所必须的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着眼。早在1950年,李先念就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地提出了“一切有碍生产发展的事情,都应尽量避免”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指导实践。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李先念的这一思想首先体现在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政策上。新中国一诞生,党中央就及时地制定了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我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李先念不仅赞成这个方针,而且及时地在实践中贯彻实施。他认为:“应该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

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经济非常落后的大国。要迅速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面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大厦,就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机构、技术和资金,这些都不是目前力量所能及的。因此,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要在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同时,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他说:“现在我们搞贸易公司、办合作社、建工厂、培养财经干部等,是为了发展城乡生产,为人民服务,并掌握必要的物资,打击一切危害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行为。”这样办的目的,是为了逐步扩大国营工商业的比重,以便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采用适当的方式替代私人资本,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然而,“全部代替私人资本是我们将来发展的方向,是多少年以后的事。”

“但在今天,我们的政策不仅允许私人资本存在,而且鼓励其按照国家法令加以发展。”这样做就是为了早日实现上述目的。李先念针对当时有些人看见私人资本家赚了几个钱就眼红的现象,明确指出:“我们的同志应该看到,在当前恢复经济阶段,私营工商业越发展,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越有利,对国家经济力量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越有利,对社会的安定也越有利。”

“他们做了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赚些钱是合理合法的。没有钱赚,他们就什么也不干,这对全局不利。”李先念同时也指出:“当然,我们允许他们获得正当的利润,而不允许他们投机倒把,妨害国计民生。还应该看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有利用的一面,还有限制的一面,我们并不是无限制地任其发展,任其照旧办法剥削。”这就有斗争。“但这种斗争不同于打倒,而是制止其非法行为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活动。”当前的问题是在经济上如果对私营工

商业打狠了，工厂开不成，商店关门，工人要失业。因此，在斗争中，要十分注意经济政策，使之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一切有碍生产发展的事情，都应尽量避免。”^⑦

在土地改革中，李先念一直注意保护中农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他认为，“巩固地团结中农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动摇”。因为，“中农是我们永久的同盟军，现在与我们一道进行土改，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将来还要与我们一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因此，在土改中决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政治上也要团结他们。应该充分利用他们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否则，不仅不利于土改的顺利进行，更不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必须避免，“这类现象一经发现，必须立即制止，并坚决进行赔偿。”^⑧

知识分子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的主力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知识分子，不用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就连社会主义也无法建成，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在一个全是文盲的国度里建成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已阐明了的问题。新中国一建立，李先念就十分注意尊重知识和尊重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要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须要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懂得这些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否则要取得经济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树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针对有些人对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工程师、专家、技术人员的尊重很不够，甚至鄙视他们的思想行为。他指出：“我们有一部分同志，似乎认为现在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是文盲还不够吓人，不尊重知识分子，不争取、团结、使用他们去改变这种状况。有的同志甚至以农民的狭隘观念鄙视知识分子，企图用各种不正确的办法来限制他们。

这是多么错误的思想！”李先念认为，要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仅凭人们的热情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只有把热情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结合起来才有出路。因此，他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发达的工业国，仅凭同志们的忠实、坚定、勇敢和牺牲精神是不够的，还必须掌握科学知识，有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才可能实现。对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倾向，是危害党的利益的，是极其错误的。”^⑨那种鄙视知识、鄙视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是无知的落后小农思想的反映。放着知识分子这支力量不用，大量浪费极其宝贵的专门人材，是“傻瓜一个”。

搞经济建设还必须实事求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要避免象1958年那样的盲目冒进、大呼隆和乱折腾。对于经济建设中的头脑发热和盲目冒进的行为，李先念一直是反对的。早在1956年，当经济生活中一出现冒进现象，李先念就及时地予以指出，他说：“1956年财政、信贷、商品都是入不敷出的，人员是增加的，这说明1956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都有若干冒进。”但是，1956年的冒进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更没有得到制止。发展到1958年则达到顶点。结果出现了“万马奔腾”的“大跃进”，括起了“共产风”。当时许多人还误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此李先念明确地指出：“这种积极性实质上是盲目性，违反了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他说：“‘万马奔腾’，还要勒住缰绳，不能成为‘脱缰之马’。”由于头脑过热，人们并没有听进这些话。其结果造成经济的重大损失。后来，李先念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1958年在财贸方面搞“两放三统一包”，结果助长了资金、物资的分散，引起了相当的混乱；在商业方面，搞乱了商业渠道，影响了城乡物资交流；在粮食等农业产品的征购上，搞高指标、高征购，结果挖用了大量的

库存,同时还提出了“棉花三集中”、“杀猪一把刀”、“粮食归我管”、“吃饭由我包”等等不正确的方针,也都给经济造成了危害;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搞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群众路线有所削弱,经济工作采取大呼隆的办法,强调搞声势,流于形式;经营管理、规章制度混乱,职工队伍削弱了,社会主义分配渠道到处漏水。他最后总结说:“大跃进时,广大群众热情很高,我们领导上犯了高指标、瞎指挥、刮‘共产风’的错误,结果损失很大,经过三年调整,才恢复过来。”^⑩他还说:“要很好总结过去的经验。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要以责人宽、责己严的态度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下功夫从主观上好好挖一下,不要强调客观原因。”^⑪以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的错误。

至于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折腾,李先念认为更是应该避免。他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这种破坏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把人们的思想观念搞乱,然后达到破坏经济的目的。李先念指出:“过去,我们要抓生产,他们就说是‘唯生产力论’,是‘用生产压革命’;我们要扭亏增盈,他们就说是搞资产阶级的‘利润挂帅’;我们为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吃穿问题,要进口几套化肥和化纤设备,引进外国的一些先进技术,他们就说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是‘把我国工业的命运系在外国资本家的裤腰带上’。总之,谁要抓经济工作,他们就给谁打棍子、戴帽子。”搞得人们不敢放开手脚、理直气壮地抓经济工作。结果,不少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许多工厂虽然没有停产,但是劳动效率低,物资消耗大,生产成本低,产品质量差,经济领域一片混乱。^⑫当时的国民经济已经跌到了崩溃的边缘。1958年的“大跃进”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这

两次大的折腾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它们在经济上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且还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两次大折腾,还有一些小折腾,耽误了许多时间。”现在,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能把耽误了的时间赶回来,尽快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人民的生活能够得到比较大的改善。人民群众的这种愿望,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致的,是谁也不能违背的。按人民的意志办事,这是执政党的职责。因此,李先念指出:“今后,工作中发生一些缺点、错误还是难免的,但一定要避免走大的弯路,小的折腾也要力求避免。”^⑬

创造比旧社会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一般地说来,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问题并不在于用什么方式夺取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而是当社会一旦占有了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后,就应该立即组织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们及时有效地利用这些要素,进行比以前社会更大规模的生产,并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经济。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应该把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根本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十月革命”一成功,列宁就及时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须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⑭李先念针对中国的实际和无产阶级政权基础的需要,也十分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认为,我国搞四个现代化,就是要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来逐步改造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用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来代替绝大部分手工业式半手工业式的劳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在批评有些人还是用小生产的眼光,习

惯、方法来看待和组织社会主义的大生产时指出，要依靠分工和协作的发展，交换范围的扩大，提高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并且还说：“对于生产企业，要促进它们提高机器设备的利用率，减少固定资产的损耗，节约原料、材料、燃料，加强劳动的定额管理，避免劳动力的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数量，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成本，减少资金的占用，加速资金的周转。”^⑤

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关键在于调动劳动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因此，首要的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李先念指出：过去，“在政治改革中，我们坚决地依靠了群众，今后的经济建设，更要进一步坚决地、毫不动摇地依靠群众。”这不仅因为“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尤其是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而且还因为“依靠群众是我们的基本观念，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因此，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以及群众工作方法，必须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特别要贯彻到经济建设工作中去。李先念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由夺取政权转移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加强行政领导和依靠技术专家，还要不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的问题作出回答。他说：“有人以为政治改革要依靠群众，不靠不行，生产建设就不一样，可以只依靠行政领导和技术专家就行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生产建设一样必须依靠群众。他辩证地阐述了依靠行政领导、技术专家和依靠群众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不错，进行经济建设是要加强行政领导，要充分发挥技术专家的作用，但是，如果不走群众路线，离开群众的智慧和热情，那就是单纯的行政观点和技术观点。”“行政领导如果与广大群众格格不入，官僚主义势必发展。技术专家如果脱离群众的实践，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不会有什么长进。”因此，

“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期都必须依靠群众，一切工作都必须将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⑥如果在经济建设中不相信群众，怕他们发挥创造性，怕他们发挥主动性，在他们的努力发展经济的毅力面前退缩，而不能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他们，必然地给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带来危害。因此，只有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人，只有投入到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源泉中去的人，才能获得经济建设的胜利。

李先念认为，相信和依靠群众搞经济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要在经济工作中，不仅重视物的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重视人的因素。他说：“我们在讨论和安排经济工作时，当然要看到物的因素，要认真算帐，这是重要的。但是，当前尤其重要的是充分重视人的因素。现在那么多亏损企业，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增产节约，扭亏增盈，一旦扭转过来，全国财政收入一年就可以增加十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现在群众中蕴藏着一种强大的迫切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动力，有一种很高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和积极性，这个力量决不可低估。李先念说：“我们在抓经济工作中，要充分估计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⑦这种积极性是极其可贵的，我们必须认真加以保护，充分利用，不能有丝毫的挫伤。总之，我们搞经济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一定要重视人的因素，要看到人的能力大有潜力可挖，依靠群众希望很大。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第92、99、105、114、150、135、120、122、118、396、278、313、396、322、143、313页。

⑰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9页。

（责任编辑 曾德国）